

自保、爱国与屈从：一个伪满“合作者”的心态探微

江 沛（南开大学）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日战争无疑是一段深重灾难。日军占领东北地区 14 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面对外来入侵者和新政权，以“闯关东”移民为主体的东北民众，陷入民族情感与现实生存间的扭曲困境，心理矛盾，迷茫犹疑，复杂心态难以言表。

在有关中日战争的一些史实仍具争议的当今，“合作者”也即汉奸的话题十分敏感，有关伪满洲国的汉奸和伪军群体的专题性研究，是一个目前中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的主要论据《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①，是稀见的伪满低级军官日记。通过对其分类梳理，从历史心理学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出发，努力理解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情感、求生欲望、迷茫心理、顺从意识的交织中，沦陷区“合作者”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实态和复杂变化的情感波动，由此审视日本侵华战争对沦陷区民众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复杂影响。

一、“伪军”士官面相：施明儒简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东北全境，摧毁了国民政府在东北各省的行政管理机制。1932 年 3 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伪满洲国成立，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战结束。在 13 年的日伪统治期间，为使东北全境成为战略支撑地，日军起用当地人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不仅可以有效减轻民众的反抗情绪，增加认同感，也可保障对占领军的军需供给，降低占领必需的政治与经济成本。日本人还需要另一类人的出场——“合作者”。

本人不去争论“合作者”、“通敌者”、“汉奸”等指代名词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在抗战爆发时、抗战中期和战后处理汉奸问题的不同时期，这些指代名词的意义均有所不同。其中夹杂着民族与道德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判断在内，十分复杂。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根据为占领者服务的动机、目的和心态，将通敌者分为四类：“为了私人利益无条件通敌的叛国者、因占领者缘故通敌的爱国的叛国者、为了生存而通敌的适应者、为广泛社区服务的有条件通敌者。”^②据此，如果要界定“合作者”这一术语的话，他们只是“在占领当局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从政治层面来讲，

^①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1-4 卷），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市档案局 2011 年版，日记时间起自 1938 年 1 月 1 日，直至 1945 年 12 月 31 日止（其中 1944 年散佚）。

^② [英]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 页。

不应被夸大为“叛国”的典型代表。东北沦陷时期，只有极少数伪满官员成为彻底的叛国者，有一些人属于另外三类，但多数民众则介于通敌者与抵抗者之间，更多的关注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日记主人施明儒，可能说是后三类人的代表之一。他是吉林省梨树人，既为伪满下级军官，又同时参与自发的秘密抗日活动：“1935年，22岁的施明儒由吉林省故乡梨树县到敦化县参加伪满军通信兵，这期间联络了三四位好友，开始建立抗日工作的初步组织，定名为‘国民党东北流亡抗日救国社’，但作者并非国民党党员，该救国社与国民党亦无组织联系。1937年组织中两名同志遇难殉国，救国社名存实亡。后来施明儒为求经济保障，于1938年考入奉天（沈阳）伪满军官学校，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1941年军校毕业后返回吉林市，任伪满军吉林市独立通信队副队长。同年5月，与4名青年秘密恢复救国社，订立组织纲领，发展至百余人。1942年他转入伪满江上军。以吉林市为据点，在德惠、九台、桦甸、磐石、敦化、蛟河及奉天、鞍山、哈尔滨等地分设联络处。作者及组织成员曾策划破坏伪满江上军第一、第二两战队舰船和爆破鞍山昭和制钢所，但均因败露而未能成功。”^①他的抗日行动多处于策划阶段，几无实施，只在日记中宣泄着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在日常生活中形同百姓，热衷于拜访亲友、购书观影、约会出游，压抑、迷茫、顺从心态明显，是一名典型的沦陷区青年。

解剖施明儒的言行，有助于我们理解枪刺下的生存压力，是如何导致沦陷区民众的心态及言行异于常态的，生活的真相远比想象要复杂得多。

二、生存窘况：何以当伪军？

研究二战期间丹麦史的亨瑞克·德斯莱夫森（Henrik Dethlefsen）曾说：占领状态下，整个社会必须适应现存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社会行为”^②。在枪刺威逼下，多数民众无力反抗，生产资料的单一导致迁移困难，生存威胁导致了沉默、造成了合作。只有基于战争情境的压力，去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对日“合作者”，或许才可能理解当事者特有的挣扎、犹豫、迷茫与顺从心理。

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施明儒，被迫选择了对日合作。日本人是他们家乡的统治者，战争使得普通民众在经历政治不适同时也要承受经济萧条。怀有明确反日侵略及爱国情怀的施明儒，记录了他1938年到新京（即长春）见学、去南岭参观战绩时的见闻，途中忆起九一八事变时驻扎在此的士兵，空怀一腔热血，终因“国贼之误”白白牺牲，大好河山沦陷，顿时悲从中来。看到开采25年、蕴藏丰富的抚顺煤矿，已“操持于倭鬼掌中”，感到刺目痛心。在到达内蒙古林西县官地镇

^①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1卷，第1页。

^② Henrik Dethlefsen,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3(1990), pp. 198-199.

时，他感叹今不如昔，半数商店倒闭，十分萧条，熟识的铺子依旧但“景物全非”^①。旧日的北边重镇佳木斯，发展“突飞猛进”，然而为“倭贼压榨所苦，致市民生活陷于呻吟状态”^②。九·一八事变前的黑河市，“市政初兴，井井有序，与对岸之苏联自由交易，互交流着风俗文化，物产丰饶，民乐其业”，如今“到处死寂寂的暮气沉沉，倒闭的商店闲放着空洞洞的房舍”，凄凉萧索，满目疮痍^③。

安德鲁·瑞格比指出，在人们的共同认识中：“叛国者至少应该为他们的罪恶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而遭受痛苦的受害者理应获得一定的补偿”^④。战争使得民不聊生，即使是被民族大义所谴责的“合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面对经济萧条，施明儒需要谋职求生。东北沦陷多年后，经济有恢复，但民众生活依旧潦倒。如因贸易隔绝，瑞士手表的零件无法更换。物质缺乏，仅次于秋林的哈市第二大商店“同记商场”，货物稀缺^⑤。结婚摄影时，吉林所有的像馆里“尺二的底板和闪光粉”，都已中断供应一年有余^⑥。除此之外，物价飞涨令人堪忧，同友商店一小包不到二斤重的冬衣 70 多元。正阳街满洲书店一部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高达 10 元。交通一度中断，职员出差要领到部队长签发的旅行证才能放行^⑦……

施明儒选择成为伪军官，看重的是便利、优渥的生活。在一次受到日军欺辱后，他坦言，忍受“这无谓的鸟气”，是为了谋求“父亲和母亲的养膳”^⑧。《日记》展现了其结婚时的筹备过程，仅婚礼的基本预算就高达一千元，囊括了“彩迎汽车、音乐、礼堂筵席、礼服、摄影”等项^⑨。在物质匮乏状态下，声称“家无恒产，绝非富第”的施明儒^⑩，能够准备一场奢侈有婚礼，得益于其所伪军任职收入。此外，人脉资源同样提供了不少便利，如他向部队长顺利请下婚礼的“白酒特别配给请求证明书”；在汽车缺乏的吉林，仍能托友人定妥两台¹¹。

施明儒声称，他对日合作的另一原因是为“抗日社”活动做掩护。施明儒“考军官候补生”前强调，他投奔伪政府并非为“伪国假功名”，而是另有“他意”，旨在“实现我之理想，补完大地疮痍”，借参加伪军工作掩护和支持秘密抗日，如获得东北抗日联军与伪军战斗的消息以便伺机而动

^①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 1 卷，第 70、89、188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347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11 页。

^④ [英]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中文版序第 6 页。

^⑤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 2 卷，第 73、290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218 页。

^⑦ 同上书，第 2 卷，第 159、336、67 页。

^⑧ 同上书，第 1 卷，第 56 页。

^⑨ 同上书，第 3 卷，第 259 页。

^⑩ 同上书，第 2 卷，第 75 页。

¹¹ 同上书，第 3 卷，第 223、259 页。

①；得知伪军对付反满抗日思想对策后能够谨慎行事^②；对谍报手段有简略了解^③；从伪军官学校中联系新同志加入抗日社等等^④。

在施明儒日记中，沦陷区“合作者”的生存状态慢慢浮现。多数民众有民族情感，但无力改变强权占领的现状，惟有自保，忍辱偷生最为实际。他们的喜怒哀乐，难以单一的道德标尺衡量。

三、“白皮”多面：“叛国”还是“爱国”？

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的宣传模式，常常脸谱化汉奸、合作者：无论何种原因，服务或听命于占领军及伪政权，总是贪生怕死，难以原谅的。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生命的权利微不足道。然而虑及日占区1亿多民众无奈做“亡国奴”的事实，让人深感这一解释体系的无力。施明儒仇恨日军占领，也有反抗行为，但纵观其表现，清醒与困惑并存，情感与实利交织，表面是服务伪满政府的“白皮”，“红心”则时隐时现，很难用“叛国”或“卖国”简单界定。

整体而言，施明儒明里服务伪满，暗中对日伪有所抵制。10余年间，他负责的抗日救国社的秘密行动与伪职工作并行，伪职是掩护其暗中抵抗的最好外衣。行军途中，作为伪满军官的他尽己所能保护同胞，遇到女教员遭受士兵轻薄侮辱，他查知真相并通报上官，严加惩处。当关东军以“别扶八路军眷”为借口、将30余名逃难女性拉去组织临时慰安所时，他“偷偷的命令情报班长，把用车拉来的女人全部放跑”^⑤。他的身份和行动的明暗组合方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敌后工作者，也与以往对于日伪“合作者”的记述方式不尽相同。

素质较低的伪军群体，时常表现出无奈求生、炫耀乡里、利权交换甚至以暴力展示地位等矛盾心境。在看到伪军严刑拷打被俘民兵时，施明儒直觉“痛心酸鼻”，坦言“彼此都是中国人，国难陷危的今日，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得如此？”；在听闻“近日士兵在街内行同强盗，拐骗敲诈、欺辱凌虐，极尽其恶”时，咒骂他们“直类兽禽、令人发指”；在“驻军受攻，上级却惶然无计不往加援，反与两位军需官挟妓饮酒，一室宣淫，士兵也效法横行”时，深感“伤心之至，并反问难道东北人真是天生的牛马心肝吗？”^⑥

“合作者”的多面性并不一定导向政治性的反抗。1940年代初东北抗联渐被压制后，武装抵抗者很少有能与日军直接作战，不得不转入地下抵抗。施明儒的伪军官身份，使其可以及时掌握情报，拥有相关技术、资金与人力支持，便利其秘密行动。即使如此，施明儒领导的小组织，十年

① 同上书，第1卷，第6、61、181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29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48页。

④ 同上书，第4卷，第247页。

⑤ 同上书，第4卷，第187-188、189页。

⑥ 同上书，第4卷，第17、220、228页。

间大小行动多次，多是晚上贴一些传单标语，效果有限，还招致三名成员牺牲。

在日伪统治无法动摇的环境中，施明儒为代表的部分人，在日伪统治下左右为难、有爱国之心又不愿毁家纾难、压抑迷茫又希冀乱世逐利，这种心理的背后是人性自保、逐利的驱动。在以往的意识形态判断及知识结构中，我们习惯性地忽视沦陷区缺少支持和组织的民众并不具有群起反抗条件这一前提；不能认为占领区民众客观上支持日伪统治；所有“白皮”的内心，也不是都甘于出卖民族利益。欺侮同胞、强取豪夺，也许只是原始劣根性和逐利行为的结果。

四、人性嬗变：屈辱与投机？

在沦陷时期，面对民族大义、民众苦难，生活宽裕并寻求自保的施明儒，决非总在心理压抑中，他的性情在形势和利益驱使中时有变化。

1938年3月，收到军官录取通知的施明儒，逃不过内心自责，觉得自己“猎取伪国的功名真是一时的孟浪”，是在“铸大错”；虽然只是“游戏官场”，但又担心同胞误解自己中途易节；同时对这份工作是否真正有益于秘密反抗行动心存疑虑，认为“塞翁失马，难分祸福，何苦为之。”

1940年8月，施明儒在行军时发现，沿途中一些地方，“树皮剥去一大片，在上面写着些宣传式标语和劝告书”的遗迹，他认为“这些是留给些苟延偷生的满洲人看的”，同时他敬告东北抗日联军的诸友，“对伪军的同情和谅解，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是决不可轻易的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决对不可信任的”^①。

身为伪军，他心系民族与国家命运。在伪满洲国建国六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初春正月，寒冷的吉林大蒲柴河突然落雨，作者直觉是上天为中国“洒同情之泪”^②。在“东北事变十周年中国恨国恨血祭纪念日”时，作者慨叹“血斑渲染成的中国”缄默不语，认为只有卧薪尝胆，才能“填补哀恨的空虚”。在“双十节”之夜，他低声高呼“革命精神不死”。在观看古装影片《红石山》时，触动了作者敏感的神经，认为每个角色都能影射出一位当代伟人。认为影片“纯为一种爱国运动呼声中的‘秘密结社’之写照”，剧中对白流露出一种“革命烈士的精神”，让其联想起“现在祸党卖国汉奸之辈，认贼作父、为莽奔走而觊享莽之利禄荣贵者”，意识到“汪逆政府和伪满洲的当局诸人”，警醒于“豺狼当道，英雄在野”的现实^③，却独独没有关联他参加伪职的苟且行动该如何定性？

随着时间推移，施氏心态更加复杂。1942年9月，他因琐事蒙受侮辱，慨叹“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是受着征服者的压迫”，声称自己并非“真正承认了征服者的权利”，只是十年来的奋斗经验及所处环境，使他明白了“某种场合下处理个性应有的态度”。作者自称，为了“青年的事业”才“曲全做人的责任”，能够以最大忍耐“接受不合理的侮辱与非理待遇”，选择缄默只是在顾惜自己在人生战场中获得的“惟一斗争地盘”。但是，“流贯在全身血管里的依旧是倔强的热血”^④。

^① 施明儒：《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第1卷，第28、184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0、129、51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71页。

这样的事在施氏身上多次发生。1943年8月，施明儒到日侨经营的木厂购柴，被告知木柴不卖给满洲人，理由是担心他们低买高卖，他只能在日记中愤怒质问：“难道堂堂的军官也会办这样卑劣的事么？”1945年8月，他双脚化脓行动困难，无法执行作战命令。在请假被日军拒绝后，心中愤恨至极，只得忍痛参战，自觉真是“流着无价值的血汗，担负着汉奸的臭名”。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底，作者回望抗战胜利，心情冷落而孤寂，觉得又平庸虚度一年，悔恨当初没逃入后方参加抗战，但后悔的是因为“没有抗战的功绩，也没有大员的亲友”，至今“不能露头角”，仍旧是“伪人”，戴着一顶“奴化”的帽子在晃^①。

对于伪军工作，施明儒从忧患焦虑到逐渐接受，顺从与无奈中夹杂着不满、愤恨和屈辱，矛盾感强烈。自1938年加入伪军到1941年底，施氏对中国抗战抱持信心。然而因对太平洋战争的错误认知，施氏自1942年起陷入了悲观，民族大义未忘，醉生梦死、追随日伪、求生自保的心态渐重。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心有抵抗、甘受屈辱的战士，正在蜕变为追求安逸、渐失大义的懦夫。民族大义与求生本性的交织原本并非是矛盾的，一人多面或许才是枪刺下众生相的本质。

施氏的复杂心态在沦陷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面对强权，有人奋起反抗，有人卖国求荣，更多的人如施氏一般被迫顺从、压抑而渐渐麻木。抗日学校毕业的新青年，在游击战线上奋勇杀敌；伪满洲国对英美宣战时，昔日同窗竟上书请出征为日本人而战，令其不齿^②；哈尔滨的市民面对满街尸体已是司空见惯^③；“昌黎男多游闲，女则华丽一身”，粉香十里，“商女不知亡国恨”，犹在晏乐自如^④。在施氏所勾画的一幅沦陷区的生活图中，民众意识从被占领之初的忧患，到1940年代中期渐渐分化，有“为‘大义’所屈，为‘人责’所缚”而积极抗日者，也有“以老母在堂，不欲冒危险”而“重身家惜生命”者^⑤，他也认为“迫于势而屈于敌者尚可藉权宜而宽恕”^⑥。回到强权占主导的殖民场景中，民众表现虽有爱国层次之差，但也是一种社会性表达，折射出的是战乱下的复杂人性。

不见尽头的中日战争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是，“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⑦民众多求顺从，“自保和私利才是根本原因”^⑧。他们多认为，占领是暂时的，国家主权终会回归，活下去才是王道。中国人固有的公私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扫门前雪，在国家层面上则常常表现为等待英雄。面对强权下的复杂人性，民族主义思潮常会呈现流于清谈而缺乏践行的窘境。

^① 同上书，第4卷，第57、225、298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11-112、124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334页。

^④ 同上书，第4卷，第205页。

^⑤ 同上书，第2卷，第47、11页。

^⑥ 同上书，第1卷，第124页。

^⑦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页。

^⑧ 刘熙明：《伪军——强权竟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余论

战时中国沦陷区遍及东部省份，沦陷区人口1亿余。日占时期最长达50年（台湾）和14年（东北），短的有七八年，也有数年。在长短不一的日据时代，日伪统治究竟给民众带来了什么？日伪政权抓捕劳工、强征慰安妇、对战区烧杀抢劫、压榨民众经济生活，都是无可辩驳的真实存在。问题在于，这只是沦陷区的某一场景，潜流下的日常生活才是主体。以往的研究，“使我们对沦陷时期的历史只有较为笼统的印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竭泽而渔、敲诈勒索、滥杀无辜、无恶不作，但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辞藻，丝毫也帮不了我们了解认识日伪政权的实际统治状况和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情形”^①。沦陷区的下层民众，被打上了民族主义的“原罪”印记，显然是不公平的。理解政治高压下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心境演变，才能深入理解野蛮侵略、政治高压戕害人性的苦痛程度。

面对入侵，沦陷区部分人选择离开或抵抗，多数人无力外逃，沉默以对，这只是一种惯常生存方式突遭变故后的延续而已。随着最初暴力频施时期的过去，民众时有错觉，零星侵扰会变为日常控制，时间不动声色地让人们逐步适应并屈服于新政权的统治。当活着的渴望压倒固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禁锢，民众的民族国家立场渐生变化，“合作者”应运而生。多数情况下，直接服务于日伪政权与谋职以求生存是不一样的，前者要鹦鹉学舌地附和日伪政权的宣传，希冀以公开言行的“政治合理性”，避免利益损失或进行生存利益的交换；后者是生存常态，如政府服务、经济服务、交通邮政、报刊出版、摆摊设点、赚取营生等，这是必备的社会运转领域，否则百姓无以为生。不能根据道德标准来推断特定场景中民众的选择，不仅是基于人性立场，更在于缺少对历史场景理解的思考毫无意义甚至有害。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一个逐步延展的传播过程，为提振抵御外侵的民气，就必须展开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主流叙事，也会情绪化地忽略民众的生存权。问题是，这种立场判断常常难敌日常生活的逻辑力量。毛泽东曾慨叹：“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②。在一贯高扬民族气节和殊死抵抗、视“合作”为亡国奴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思考每当民族危机都会出现汉奸蜂起的奇异现象？

中日战争史既是一部侵略与抵抗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合作史”。以往的研究中，“强权下的生存”常与汉奸、“合作者”相关联，所包含的立场判断及道德判断，常会引导并束缚我们的思维。从强权下生存的角度考察东北沦陷区对日“合作者”心态时，我们看到了比已知的更加灰暗的

^① 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 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 页。

^② 毛泽东：《祭黄帝文》（1937 年 4 月 5 日），《新中华报》1937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

故事和更加曲折复杂的艰难抉择，这是努力勾勒出中日战争史全景的前提条件。

■ 江 沛 (Jiang Pei)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学会副理事长。2014-2020 年间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编《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丛书》等，曾先后任日本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的研究，任首席专家。

主要著作：《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国民党结构史论》（下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华民国专题史丛书之九），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